



两会闭幕,代表委员“好声音”不能停

两会结束,并不是代表委员们履职的结束,而是新一轮履职的开始。另一方面,民众也期待代表委员能够更多地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关注民生。

 杨三喜

昨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2900多名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以及“两高”工作报告进行了审议和表决,为期14天的两会紧随着宣告结束。

本次人大会议共收到代表团、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462件,代表建议8609件。政协会议共收到提案5375件,立案4248件。代表委员积极就各自关注的问题提交议案提案,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建言献策,积极反映民众心声。

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通过媒体、网络等,以接受采访、撰写专栏等方式,针砭时弊,就热点问题积极发声。而民众则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听到了许多过瘾的“两会好声音”,实现了与代表委员“亲密接触”。

比如,朱征夫委员在接受采访时提出“让犯罪嫌疑人

上电视认罪要慎重”“废除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又如胡季强代表建议,制定《罕见病防治法》,保护患者权益;贾康委员建议,尽快开征环境税。

这些声音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民众的权益密切相关。在两会的聚光灯下,经由代表委员们表达出来,更有分量。它们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社会情绪的一种释放,既有利于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也更容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行动,从而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

两会结束,并不是代表委员们履职的结束,而是新一轮履职的开始。代表委员们回到基层之后,对政府以及工作人员的监督,应继续保持锐度和力度,参政议政、针砭时弊的热情也应继续饱满。

另一方面,民众也期待代表委员能够更多地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关注民

生。在提交建议的同时,拓宽参政议政的渠道,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积极通过媒体发声,让民众更多地听到、看到代表委员的声音和行动。这既是解决问题的助推器,也可充当社会情绪的软化剂、减压阀,有效缓解社会矛盾。



官员无论升迁与否都不应想着发财

公务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有升职的欲望乃情理之中,毕竟对于那些有能力、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更好的平台自然更利于个人才能的发挥,也能够让更多的群众受益。但无论升职与否,都不要想着发财,更别把这当作贪腐的托词。

 张松超

近日,广东党风杂志披露了佛山市食药监局原局长戚耀方腐败案细节。从简历看,戚耀方本是一个有能力并作出了一定成绩的官员,然而从医院调到卫生行政部门工作后,收入的减少使他产生了不平衡,尤其与一些企业老板、包工头的交往,让他感到了自己的“寒酸”,于是产生了“吃亏心理”,最终走向贪腐之路。

升了官却没发财,戚耀方实施贪腐行为的心态,很容易让人想到河北省大名县原县委书记边飞,因为后者的贪腐理由恰恰与前者相反——不升职便贪腐。那么这些案例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升官与否都能成为某些党员干部贪腐的理由,这就不得不让人反思,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不管是升官不发财而贪腐,还是不升官才贪腐,都是一种诡辩逻辑,完全站不住脚:不升官就发财,尽管反映了当下官场晋升渠道的部分问题,但其做官的目的岂不成了升官?否则就可以随时在岗位上贪腐,最终再把理由归咎于“不升官”;而升官不发财的逻辑则更加赤裸裸,因为其心态本来就是畸形的,完全把升官当做了发财

的途径。升官与发财到底是何种关系,为官者该以怎样的心态认识和平衡这两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早就说过,“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这其实也间接回答了,不管升官与否,只要是为官,就不要想着发财,要想发财就去合法致富。但升官不发财与不升官就发财的现实情况,需要为官者摆正对于“升官”的认识,因为其在很多时候,确实构成了不少官员贪腐的理由,抑或是一种借口。

有必要明确指出,官员追求升职并不是件丢人的事,也并非病态心理,不能因为有些官员因此贪腐了,就否认这一追求本身的正当性。事实上,公务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有升职的欲望乃属情理之中,毕竟对于那些有能力、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更好的平台自然更利于个人才能的发挥,也能够让更多的群众受益。而反过来,对于那些怀着不良动机的升迁追求者,实则是在权力不受约束下的私欲膨胀,与升职与否无关。

党员干部必须摆正对升官与发财的认识,即你可以追求升官,但千万不要有发财的奢望。对于腐败行为,何时都没有正当理由可言,最终都必将接受党纪和国法的制裁。要知道,追求升迁永远都没有原罪,事后的私欲膨胀却把原因归咎于升官与否,则注定只是一个笑话。

管理越“装睡”问题就越多

电动自行车从生产、销售到使用,整个产业链都处于野蛮生长状态,岂是一个“乱”字概括得了。管理越是“装睡”,行业问题就越多。

 连海平

“电动自行车大量违法已成为城市交通秩序混乱和拥堵的主要症结之一。”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徐加爱日前表示。他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标准不完善导致电动车生产无序发展,法律法规不健全致使缺乏必要管理手段。

小小的电动自行车,是大大的民生话题。对一个电动自行车大国来说,其民生分量不仅是过亿辆保有量。目前,购买、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群体,或从事快递、送货等服务,或用来上下班、接送孩子、上街买菜等。对于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电动自行车就是他们赖以生活乃至生存的工具。因此,管理者一声“咳嗽”,他们往往就可能“感冒”。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圈子日益扩大,对电动自行车的需求越来越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对汽车、摩托车采取限购、限行措施,给电动自行车补位也留下了巨大空间;随着城市交通拥堵和大气污染日益严重,低碳、环保、便捷的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受到市民青睐……存在即合理,电动自行车大行其道实属必然。

与电动自行车的产能、销量、普及水平相比,管理的步子就远远比不上电动自行车的发展增长速度,要么采取“鸵鸟政策”——1999年出台的国家标准一直沿用到现在,眼睁睁看着“约有90%的电动自行车都不符合国家标准”;要么采取“孩子与脏水一块倒掉”的策略,开展整治行动,交警集中上路,见车就拦。

其实,管理越是“装睡”,行业问题就越多。电动自行车从生产、销售到使用,整个产业链都处于野蛮生长状态,岂是一个“乱”字概括得了。在新标准不出台,生产、销售都没有有效管理的情况下,老百姓花钱购买了电动自行车,却告知他们不能上路,谁咽得下这口气?管理手段越粗暴,公众反弹越大,配合度越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万家忧乐放在心头,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什么是“万家忧乐”,怎样才算“放在心头”,这值得相关管理部门好好玩味。

打通城乡壁垒应是一道双向题

目前中国农村最需要的与其说是乡贤文化,不如说是打通城乡之间的壁垒,让城市更好反哺乡村的需要,这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必须解决的最大难题。

 张天蔚

面对乡村日益凋敝的现状,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提出,应当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对农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彼时,一方面不断有乡村精英通过科举考试,远离乡土踏上仕途。另一方面,则是不断有致仕的官员返回家乡,以其为官一生而积攒的资产、人脉、见识造福乡里,成为乡村中的乡绅。这些退休官员与屡试不第而留居乡村的学子组成的乡贤群体,共同构成了传统乡村的礼教根基,维护了乡土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同时,离乡返乡的往复更迭,也形成了祠堂与乡土、城市与乡村的循环、回馈机制,乡绅、乡贤作为毛细血管,把文化和经济资源不断向乡村输送,回馈、滋养着曾经生长于斯的乡村。

如此诗意的乡村图景,随着工业化进程被戛然斩断,农村开始“人去村空”。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退休官员返回乡村,成为新一代乡绅,以此重建乡贤文化,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乡村的衰败萎缩,也是趋

势使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退休官员愿意回乡,究竟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乡村生活,进而在乡村建设中以“新乡绅”的身份发挥作用,其实很值得怀疑。况且在当下严格的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下,退休官员即便是回到家乡,也将陷入“无立锥之地”的窘境。而若如钱念孙代表所建议的“国土资源部门能否给出相关政策,将返乡者的住宅纳入美丽乡村建设整体布局”,则等于在现有土地制度上撕开一个口子,让回乡官员退休之后又享受一次土地特权,将制造新的不公和矛盾。

其实,目前中国农村最需要的与其说是乡贤文化,不如说是打通城乡之间的壁垒。以往论及城乡壁垒,往往单指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壁垒,但目前更需要打破的,是城乡双向交流的壁垒。随着城市生活的日益拥挤、嘈杂、污染,已经有部分城里人开始产生返回乡间生活的需求。而如果这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则随着人口向乡村的倒流,将是资金、观念、文化、秩序等一系列公共资源的回流,这样的回流给乡村带来的滋养和改变,可能比少数退休官员带来的更多、更大、更有效。

不以照顾回乡官员为目的,而是通过全面改革,打通城乡壁垒,让城市更好反哺乡村的需要,这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必须解决的最大难题。